我在片场调度千军万马

□乔和平/口述 余木/整理


乔和平在片场。

凌晨四点，天还是黑的。野地里已经站满了人，少说也有上千号。一个人登上一座几米高的木台，举起高音喇叭喊：“所有副导演和演员迅速回原位，按实拍，最后带机走一遍！预备——开始！”底下黑压压的人群跟着他的手势，哗地分开……等到排练完毕，导演到场，早上六点半准时开拍，不管多少人的大场面，从未误场！

这个站在高处排兵布阵的人，叫乔和平。40年里，他在《天下粮仓》《长城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《八佰》《赤壁》等大剧大片的现场，营造出一个个千军万马、气势恢宏的大场面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在张艺谋、吴子牛、吴宇森等顶尖导演身边工作的第一副导演，就是我们宁波人。他在江北的英雄水库边有一幢农民房，一楼进门，就放着一台充满年代感的放映机，二楼东间更是放满了他从影40年来各地搜罗、购买的一台台古旧的胶片摄影机、放映机，插上电，都还能转……

1 父亲调防去了上海，我留在了宁波

我是5岁那年随着父亲的部队来到宁波的，祖籍是河北。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军，他来到浙江的第一站是台州路桥，第二站才到的宁波江北，我从小是在离人民路不远的压赛堰机场的部队大院长大的。

老子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，做儿子的也不能孬，到了入伍的年龄，我也穿上了一身军绿。不过，打小喜爱文艺的我，加入的是部队的宣传队。宣传队要求成员一专多能，我打快板打得好，可没学过乐器，领导就说，你挑一样，我说那就学二胡吧。部队战友教了我一些基础的，我又不断寻找机会，去专业的音乐学院进修。我后来的艺术积累，就是从一把二胡开始的。

退伍的时候，父亲调防去了上海，按部队规定，哪儿来的哪儿去，上海是去不成了，怎么办？宁波也挺好，就回宁波吧。这么着，我这辈子就扎根在宁波了。

那时候进大厂当工人，是很多人的向往，可大厂里喜欢吃喝玩乐的年轻人扎堆儿，而我只想着能多些自己的学习时间，追求我的文艺爱好。听说给宁波拖拉机厂配套的活塞环厂闲人少、风气正，我就去了那个小厂上班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全国实行严打，江北槐树路派出所把我借调了过去。发现我有艺术特长，江北区公安分局政工科又把我调去了科室。那几年，市局张罗搞文艺汇演，我拿了好几回一等奖，你想想，我只要出一个二胡节目，就没人能和我比的。多年来，对专业艺术的不懈追求，给了我十足的底气和信心。

市局看中我的文艺才能，让我参加市局的演出队，到各分局巡回演出。这又使我的文艺才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和提高。当时，影视艺术正蓬勃发展，我又抓住时机，参加了宁波这边多部影视剧的拍摄。这也让我有机会在1996年，碰上了导演许雷，就是拍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那位，他是中国第四代导演中兼具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代表性人物。

许导跟我说：和平，你那么喜欢电影，老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混可不行；搞电影，你就得去学电影，这样路才能走得长。一句话，点悟了我，把我推向了另一条路。


乔和平与他的“宝贝”。（沈炜 摄）

2 四十二岁，我“光着身子”去了电影学院

1996年10月，我刚从电视剧《真命小和尚》的剧组回来。许雷导演的同班同学、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司徒兆敦传话过来：学院要办一个全脱产的导演大专班。这又给了我一个机会！当时我已经42岁，要我“光着身子”离开体制，着实得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；但不经专业学习，又怎么能真正拍好电影呢？去之前，当时市局三处的李谦处长找我谈话，问我：想好了没有？我说想好了。他说，想好了就一往无前。

从此，工资没了，组织关系没了。同事们跟我开玩笑：老乔你好好努力，一毕业就退休了。后来我有幸跟从几位伟大的导演、参与了多部伟大作品的创作，一部一部片子拍回来，他们再见我，改口了，说：你是咱们公安兄弟们的骄傲。

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，对于影视创作，我以为自己还懂一点。但来到学院，我是越往深处学，越感到自己的不足。当时，司徒兆敦教视听语言，苏牧教我们编剧，谢飞教我们导演……那可是培养出了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第五代导演的教师天团呀。我何其有幸，得到了这些老师们的教导，真正奠定了我后来的创作底子。

在学院学到了一点本事，又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专业的魅力。这不，书还在读，戏就来了。潇湘电影制片厂准备拍《国歌》，导演吴子牛在全国找执行导演，厂领导就推荐了我，说就找乔和平吧。但当时被推荐上来的还有另一位副导演，吴导说：一人拍一场大戏，谁拍得好谁留下。我拍了《国歌》开场的那场大戏，拍得不错，就把我留了下来。后来，在拍大场面的关键时刻，学院要我回去参加期中考试，我拍摄工作紧张，分身乏术，怎么办？在剧组和电影厂的协调下，学院同意我可以补考。这样，三年大专，我读成了四年，好在各科成绩都不错，编剧课还考了97分。

这件事我后来琢磨过很多回：一边是有机会参与这么重要的作品的拍摄实践，机会难得，一边是我自己欠下的那份功课，两头我都不能松手。这让我更笃信一件事：一切都得靠你手上真功夫！从影这么多年，我的大场面调度，很少重复返工，秘诀就是在我所负责的工作范围，我想得比谁都要周全，尤其在大场面设计调度上。

拍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时候，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大场面镜头会，摄影指导用电脑模拟了镜头跟着银甲军，从太和殿冲到乾清宫的长镜头，画面落幅在乾清宫大殿全景上……我们都 围着看，张艺谋导演说一个字：推。推上去，宫殿构图不完整了。张导说：再推。画面落幅在带着大殿房沿边角的银甲军进攻队伍的主体上，他说：就要这个。所有人立刻明白，张导想表现的是人，不是景。我们做配合工作的，得非常清楚导演要的是什么。没有学院的专业功底，做不到跟导演同步思维，你是跟不住的。为此，我由衷地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给予我的专业教育！

3 这些老机器，我想让它们留在宁波

从影40年，我最大的幸运，就是跟从那么多大牌导演，参与拍摄了那么多大剧大片。其中几部重要作品的海报，我把它们贴在我家客厅的墙上，时时激励着我对电影艺术的不懈追求。你要问我这些年都到过哪些地方——这几十台机器就是答案，它们都是我从国内外的拍摄地，发现有老摄影机，出钱购买甚至没钱时借了钱买回来的。我收藏的这些“宝贝”，实际上沉淀了世界电影百年历史的厚重记忆。

比如这台莱卡的老机器，水晶镜头、象牙刻度盘，连德国原厂都想往回收。有一回，在我参与的一个模特大赛的活动现场，莱卡公司托人来跟我说，他们想用一辆奔驰车来跟我换，我没换——奔驰车可以花钱买，这台机器没了就没了。

除了这些机器，我这边最珍贵的东西，还有一批北京电影学院78班各系的教材，都是老师们亲自刻的钢板、一张张油印出来的，张艺谋导演那届当年用的就是这些教材。要研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是怎么造就的，这可是重要资料，看着这些，就令人敬仰与振奋。我相信，这些东西将在时代光影里，越沉淀越闪光。

在120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，第一代宁波的电影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，是真正的开拓者：张石川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《难夫难妻》、第一部有声片《歌女红牡丹》，桑弧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《祝福》，袁牧之是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，郑崇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35毫米有声摄影机……我们这一代宁波电影人，应当继往开来，把老一辈宁波电影人的开拓精神传承下去。

目前，我手头策划着好几个跟宁波历史人物相关的电影创作项目，比如关于左翼伟大作家、红色诗人、革命家殷夫的，比如关于1862年慈城百姓反击清廷，将洋枪队队长华尔击毙的故事。

我拍了大半辈子电影，还在第一线，但目前来说，有这两个主要的心愿：一是想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把这些老机器、老教材和拍摄时留下来的资料陈设出来，建一个可以交流电影创作的博物馆；二是把这些我想拍的宁波题材电影，呈现在银幕上，为厚重的宁波电影文化再添一笔。